

東方博物

第三十八輯



浙江省博物館 編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東方博物

第三十八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伯敏 毛昭晰 李学勤 朱凤瀚 苏东海

杨伯达 罗哲文 徐邦达 徐苹芳 宿白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鲍贤伦

副 主 任 陶月彪 陈官忠 吴志强 陈 浩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屹峰 许洪流 李小宁 吴志强

陈官忠 陈 浩 赵 丰 柴眩华

陶月彪 康熙民 鲍贤伦

主 编 许洪流

执行主编 王屹峰

東方博物



第三十八辑

- 5 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 单霁翔
- 22 用 CMS 系统构建博物馆主题展览网——以温州博物馆为例
王光宇
- 27 长兴大云寺唐代陀罗尼经幢 杨美英
- 33 海宁盐官安国寺唐代陀罗尼经幢 张宏元
- 43 宋兴福寺七佛塔考略 叶挺铸
- 54 缙云仙都金龙洞出土铜龙与木简 黄彩红
- 58 宋代官窑的几个问题 李 刚
- 69 吉州窑纪年瓷的发现与研究 彭明瀚
- 78 论浙江和福建的珠光青瓷 董健丽
- 85 关于日本出土的墨书陶瓷 [日] 小野裕子
- 100 晚清民国时期陶瓷业之新政及其影响 陈 扬
- 108 临海上山冯出土春秋战国青铜器 王海波
- 112 皖南青铜兵器研究三则 朱华东 管丹平
- 117 对江山山崖尾遗址的再认识 汪 萍 詹 剑
- 121 安吉高禹发现东汉熹平五年纪年墓 邱宏亮
- 125 兰溪永昌孔塘东晋墓清理简报 周菊青 吴建新
- 封二 江西上饶南宋开禧二年墓出土吉州窑木叶纹盏
- 封三 江西南昌南宋淳熙纪年墓出土吉州窑玳瑁纹罐
- 封面 南宋余姚官窑青瓷梅瓶

MAIN CONTENTS

5 Site Museum of Protective Reuse

Shan Jixiang

Abstract: Site museum is a type of museums that exhibit soci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event, and people's activity through particular places, such as historical building, famous people's residence,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dentify their cultural implications, to display their characters, to explore conservation methods of site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so as to properly reuse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site museum, protect, use

4³ Seven-Buddha Pagoda Group of Xingfu Temple in Song Dynasty

Ye Tingzhu

Abstract: In April of 2009, more than 40 remnants of masonry pagoda in Song Dynasty were discovered under the Xingfu Temple site at Gaolou Village. They are identified as stupa styled seven-Buddha pagoda group that belonged to the original Xingfu Temple in Song Dynasty. The plan of pagoda is hexagon. Each pagoda consists of four parts, which are two-tiered Buddhist Mount Sumeru base, convex hexagon body, roof modeled on timber-structure counterpart, and top decoration. Small stupa styled masonry pagoda was common in Zhejiang-Fujian area in Song Dynasty but few of them remains until today. It is rare that the complete group is conserved and is even rarer that each one still has inscription of Buddha's name. The discovery of masonry pagoda group of Xingfu Temple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Buddhist culture in southern Zhejiang. They a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 of seven-Buddha masonry pagodas in Song Dynasty,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Lower Yangzi area, and folk stone carving craft at that time.

Key words: seven-Buddha pagoda group, Xingfu Temple, Song Dynasty, Rui'an

5⁸ Problems on Official Porcelain Kilns in Song Dynasty

Li Ga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official porcelain kilns of Song Dynasty has drawn scholarly attention for long. Althoug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everal aspects, some problems still remain unresolved. Why did royalty of Northern Song have Ru Zhou make green porcelain? Where is the kiln directly set by royalty? Is Zhanggongxiang Kiln in Ru Zhou the "Ru Zhou New Kiln", the official kiln in a limited sense? How important is Yuyao official kiln of Southern Song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Nei Kiln? Where is "Wuni Kil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se problems and suggests some new propositions valuabl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Ru Kiln, Ru Zhou New Kiln, Yuyao official kiln, Wuni Kiln

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

单霁翔（国家文物局 100020）

【摘要】旧址博物馆是指利用特殊的空间来展示社会发展、事件发生、人物活动历史瞬间的博物馆，其中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工业遗产旧址博物馆等均是重要的表现形式。充分挖掘这些旧址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展示建筑旧址的文化面貌及特色，探索保护旧址博物馆真实遗存、历史环境的有效方式，从而实现对旧址博物馆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等课题，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旧址博物馆 保护 再利用

旧址博物馆一般是指利用特殊的空间来展示社会发展、事件发生、人物活动历史瞬间的博物馆。旧址博物馆可以分为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代表性建筑、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纪念地、承载某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等多种类型。目前，在中国 3020 座博物馆中，旧址博物馆约占四分之一，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已是中国博物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工业遗产旧址博物馆等均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一 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地，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昔日风貌和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成为了历史纪念地，也成为了旧址博物馆的首选地。对于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代表性建筑，可以利用其历史遗存建立专题博物馆，表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展现

当时的社会面貌，满足社会教育需求；对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酝酿和发生的纪念地，可以利用其所保存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建立专题纪念馆，展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发生过程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能够更清晰地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提供宝贵历史借鉴；对于承载某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建筑，可以利用其文化特色，建立展示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专题博物馆，深入发掘传统文化精髓和传承关系。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的展览主体是旧址复原陈列，需要以真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或者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为佐证，应当以旧址中历史建筑和实物展品真实、形象地向观众进行某一历史时期以及某一历史时刻的展示。事实证明，依托历史建筑旧址建立的博物馆，能够成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宝贵文化资源和独特文化场所。

（一）挖掘建筑旧址文化内涵

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具有一般博物馆所不具备的本质属性，即历史建筑具有不可移动性，必须依托于旧址才具有存在的价值，通过对历史建筑及周边环境的形象展示，配以相关的辅助陈列，对旧址的历史

价值进行深刻诠释,揭示和深化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才能给参观者以更加丰富、准确、系统的知识。今天,人们意识到,赋予历史建筑以恰当的新功能,将成为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海德公园营房建成于1819年,直到1848年,这座乔治式建筑一直作为监禁600名男囚的夜间寄宿处,后来它成为一座旅馆和女性移民的劳务市场。1887年至1979年间,法院和政府部门总共有超过50个机构曾在这里工作过。1980年,海德公园营房成为第一批主要由政府资助进行考古研究的历史遗址之一。经过12个月的调查研究,揭示出这座营房170年深刻而独特的历史。海德公园营房博物馆的设计,使这一旧址成为包含历史建筑整体建造方式、考古遗迹、历史性文献及设施的文化遗存及文化体验。其中重点放在收容囚犯的时期,因为现存的建筑物多是反映这一时期的状况。例如最能唤起人们对囚禁想象的建筑顶层已被保存并修复,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真实面貌,为人们了解19世纪严酷的监狱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1]。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首先要使旧址文物本体“延年益寿”。因此,如何在历史元素与新的功能之间决定取舍,找寻保护“记忆”与展示“记忆”的平衡点,是不能忽视的问题。然而,很多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在筹建过程中,大兴土木,热衷于建设大体量的展馆、营造大制作的展览,盲目拆改原有历史建筑,破坏历史氛围和生态环境,影响建筑旧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原应处于主体地位的历史建筑旧址,反倒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形成了建筑旧址和基本陈列主从地位倒置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树立正确的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营建理念尤为重要。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帝王庙,曾经长期被北京第159中学占用,学校没有正规操场,主要活动空间只有大殿前的一个篮球场,大殿兼做风雨操场、会场和库房使用,学校用房不够,凡能盖房的地方都盖满了平房、楼房,还把古代建筑景德门、御碑亭封砌起来当作办公室使用。古代建筑内通风采光很差,夏天闷热难耐,冬天靠煤炉取暖,有的古代建筑还用作校办工厂,院内电线密布,消防设施缺乏,文物建筑年久失修,

多次发生塌檐事件。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重要文物建筑的安全隐患,2000年12月,正式启动了历代帝王庙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经过3年多的努力,终于将中学迁出安置,历代帝王庙得以全面修缮,并作为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对外开放。

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中很多是依托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或历史人物的活动地,进行实物陈列而建立的旧址博物馆,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生与活动场所的复原,以及文物藏品展示,再现当时的场景,勾勒出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北京的北大红楼犹如一座丰碑,铭刻着人们永远的回忆和缅怀,在车水马龙的喧嚣闹市间,默默地矗立了百年,成为现代都市中一个永恒的地标。2002年,以北大红楼为依托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成立,并向社会开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后,深入考证新文化运动时期红楼内的房屋布局,以及当时著名人物、社团、机构的使用情况,为旧址复原提供科学依据。通过详细考证,已经掌握了历史建筑内各个房间的功能布局。例如地下室为印刷厂,著名杂志《新潮》、《国民》、《北京大学日刊》等,都曾在这里排版印制;一楼大部分是图书馆,有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新闻纸阅览室等;二楼是校内行政机构,有校长蔡元培办公室、文科学长陈独秀办公室、各科教授会等。通过对北大红楼各类房屋旧址的复原,并辅助一些小型的专题展览,全方位展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风貌,再现北大红楼内每一处房屋旧址最值得纪念的历史瞬间,营造历史氛围,让参观者走进红楼,身临其境,感受历史沧桑。这种实地展示效果是一般博物馆所难以达到的^[2]。

上海澳门路477号是中华书局总厂旧址,因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被列入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然而,2009年下半年,这组历史建筑面临诞生70年以来,一次从建筑结构到使用功能的改造,即当地政府拟将中华书局旧址变成“创意产业园”。但是这一改造计划,使一些上海文化出版界的人士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这组历史建筑有着特殊记忆和情感联系。同时,改造计划也在参与这组历史建筑改造利用的专业人士中间引起讨论。中华书

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女儿担心旧址改建酒店、商铺与公寓,原本大开间的建筑,多了分隔墙,添了上下水道、空调等生活设施,会对原有结构造成破坏。多年来,上海文化出版界人士一直建议将2万平方米的中华书局旧址的一部分,改造成为上海出版博物馆。老出版家丁景唐认为中华书局总厂的价值在于其内在传承的无形文化财产,这是上海乃至全国仅存的大规模、高质量的近代出版文化遗存,70多年间尽管机构名称、体制不断变化,却一直在印刷出版行业内部流转,历史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再利用时不应人为割断历史传承。从2000年起,几乎每年上海市“两会”期间,均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建议或提案,呼吁利用中华书局旧址,抓紧建设出版博物馆,认为利用这样一处能显示上海中国出版源头地位、具有标志意味的历史建筑,建设出版博物馆将是中华书局旧址的最佳选址^[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设施,由于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使其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罪恶行径,从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目前对参观者开放的731部队基地遗址,由150多幢建筑组成,经过精心设计,十分坚固,包括各类生产设施,有约4500个培养跳蚤的容器,6个巨大的制造各种化学制品的锅炉,以及约1800个用于生产生物试剂的容器。1939—1945年,至少有3000余无辜生命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作为活体细菌实验材料,无一生还。从731部队生产出的数十吨生物武器以及一些化学武器,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我国东北地区许多地方。1945年8月,在败退时为了销毁罪证,日军下令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并要求其部下“把秘密带进坟墓”。岁月流逝,如今731部队遗址混杂在城市生活区中,周边环境杂乱,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永久保存这一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近年来对遗址进行全面清理,发现大量当年的遗存,同时采取措施对遗址进行保护。目前,731部队本部大楼遗址和2号楼遗址已经维修复原,在此基

础上,一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建立起来,使这一反人类罪行昭示天下,引发全人类反思战争,关注和平^[4]。

(二) 展示建筑旧址文化面貌

“保护并不意味着将其束之高阁”。保护历史建筑的最大动力是保存文化,以便对人类的共同记忆提供寄托与思念,因此,需要以智慧和创意来权衡对建筑旧址的定位,挖掘建筑旧址的文化底蕴,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使历史建筑以“活态”的面貌出现,做到既科学保护又合理利用。事实上,只要历史建筑在使用,就会被不断维护,就不会因为被闲置而加速损毁。由此看来,为历史建筑旧址与人们的现实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创造使闲置空间再次获得继续生存的契机,为历史建筑旧址寻求新生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方式。即采取合理利用的方式,使历史建筑旧址得到再生,进而再次与社会公众生活结合在一起,延长其使用寿命,创造出新的价值。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具有很多普通博物馆所不具备的特点,有些是它们的优势,有些则是它们的弱势。由于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所依托的历史建筑大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文物保护单位内部结构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历史建筑旧址往往不适合大型陈列展览,保护要求与使用功能之间存在矛盾;历史建筑旧址的周围环境要保持原有风貌,又要与博物馆的功能相协调,不得随意改变,因此相应的配套设施,例如道路交通、停车场地等受到限制;由于历史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在文物保护和安全防范方面任务艰巨。

巴蜀地区会馆是明清时代外省向四川大移民的产物。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从而引发了历史上跨越100多年,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的各省向四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会馆是一种客居、流寓外乡的商人、官吏或迁徙的移民群体,为共同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以地域同乡为纽带的民间组织形式。重庆湖广会馆始建于明末清初,是由湖北会馆、广东会馆等组成的大型移民会馆建筑群,占地面积逾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会馆建筑依山就势,北靠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充分反映出重庆曾经作为移民城市的文化经济特色。但是2003年2月,



图一 北京恭王府

当笔者到重庆湖广会馆调研时，看到由于历史变迁，会馆建筑群被埋藏于杂乱无章的工厂、仓库和民居之中。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内部空间任意分割，裸露电线密如蛛网，历史建筑破败不堪，随时面临毁灭危险。2003年5月重庆市开始对湖广会馆内268户居民和单位实施排危抢险性搬迁安置，并于同年12月修复工程开工。在湖广会馆的修复过程中，强调历史建筑修缮“不改变文物原状”和“可识别性”原则，探索适合东方砖木结构体系的历史建筑修复方法。2005年9月重庆湖广会馆修缮工程竣工并对外开放，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建筑旧址文化空间，体现出城市厚重的历史和海纳百川的气魄，成为重庆重要的民俗文化保护、展示、传承场所。

恭王府是北京王公府邸中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文化价值，也见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高度评价这座声名赫赫的王府的重要地位。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建筑格局为三路五进，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1921年恭王府府邸及花园被抵押给天主教会。1937年辅仁大学将其购置作为校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度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占用。恭王府府邸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于2005年正式开工，这是自1850年以来恭王府最大的一次修缮。这次修缮按照清代同治、光绪时期恭亲王最辉煌时期的原貌进行，有历史依据的按照原样修复，没有历史依据的按照专家指导意见修复，既无历史依据、专

家又有分歧的按照现状进行保护修复。2008年8月，恭王府府邸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这是232年以来恭王府府邸首次对公众全面开放。希望通过不懈努力，使这座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在古都北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独特作用。但是，恭王府中原本收藏有大量珍贵文物，经过历史变迁，大量家具、字画、陈设、收藏品都已散失。目前，恭王府管理中心已向社会公开征集王府原有文物，并制定了文物捐赠奖励办法^[5]。

与一般博物馆相比，利用历史建筑旧址设立的博物馆，更要求馆舍与周边环境的历史氛围相匹配，使人们从馆舍上体验到真实的历史，从环境中获取到更多的信息。因此，对于历史建筑旧址的保护，在保护历史建筑真实性的同时，还要保护周边环境的完整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建筑旧址的保护状况往往不尽如人意。目前即使对于北京故宫来说，皇家宫殿建筑群也并不完整，还有一些缺憾。例如位于故宫东面的皇史宬，是明清两朝皇室档案储藏所，也是我国现存唯一的皇家档案馆，反映我国封建时代的档案制度，是故宫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即对皇史宬实施管理。1980年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皇史宬由第一历史档案馆管理。如今皇史宬院内搭建有大量非文物建筑，住有居民，既破坏了历史建筑及其环境，又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另外，在故宫博物院内西华门南北两侧，1974年以故宫生活用房的名义添建了高度超过16米的5座楼房，俗称“屏风楼”，从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上，破坏了故宫的历史风貌和整体格局。因为这些楼房建设的需要，拆除了西华门两侧城墙的马道，不仅对历史建筑造成了破坏，也直接影响了故宫的统一保护管理。使用单位的各类车辆每天从西华门进出，造成环境污染，形成安全隐患。

安江农校位于湖南洪江安江镇，始建于1939年。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此生活和从事教学、杂交水稻研究长达37年。“一粒改变世界的种子”——杂交水稻就是在这里经过艰难探索取得突破和成功。杂交水稻研究成果在世界科技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先后获得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和联合国“世界粮食奖”等殊荣。安江农校见证了袁隆平及其团队的

科学研究奋斗足迹,成为“隆平精神”和杂交水稻研究历程的大型物证,也是人类稻作文明历史发展的真实载体。2008年,安江农校老校区更名为“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园”,园内保存了具有一定规模的、1939—1986年间特定历史时期修建的、时代特征明显的各类教学及科研设施,例如办公楼、校训牌、袁隆平旧居、鱼鳞板教学楼、杂交水稻温室、鱼塘、早期杂交水稻试验田、捞禾深井、玻璃温室、高温抗病鉴定圃等,将杂交水稻研究历史全过程,以实地、实物真实记录下来,为丰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提供珍贵素材。2009年8月,国务院将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园这一活态的、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纪念园占地250余亩,建筑面积4万余平方米。这里不但继续承担着国家杂交水稻中心的科研任务,承担着数千名农民科技骨干的培训任务,而且成为集文物展示、人文景观、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6]。

(三) 突出建筑旧址文化特色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不能任意妄为,抹杀原有历史建筑的生命,而是要在保留旧址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在保护历史建筑原貌的同时,经过适当的建筑结构评估,针对安全状况进行改善,发挥原有材料的优点,使建筑旧址获得更好的生存状态。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而孔庙则是皇家祭孔之地,两者相伴,形成“左庙右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子监里开设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则在孔庙内建立。近年来,北京市陆续将首都图书馆和首都博物馆迁出古代建筑群,使国子监与孔庙合为一处。如今,孔庙与国子监修葺一新,合并成为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7]。神乐署位于北京天坛的西南外坛,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为天坛的五组重要建筑之一,是为了满足皇家祭祀礼仪需要,教练舞生、乐生,演习祭祀乐礼的机构,也是祭天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4月,天坛神乐署修缮工程竣工,不但很好地恢复了历史风貌,而且作为中华古代祭祀音乐博物馆向游人开放,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中国古代最高祭祀礼乐——中和韶乐。镇江博物馆利用原有的历

史环境,将五幢建筑按原英国领事馆的旧貌进行恢复,整个博物馆区按英国式园林风格进行整体环境景观整饰,水体、绿化、凉亭与历史建筑浑然一体,表达出建筑本身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形成花园式博物馆^[8]。

加拿大建筑师P.M. 歌德史密斯(P.M.Goldsmith)认为:“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是找到它‘再利用’的方式。”今天人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9]。同样在澳大利亚,悉尼博物馆在第一个总督府遗址上建造而成。1788年,A. 菲利普(A.Phillip)总督建造了第一座总督府,在1845年被破坏以前,它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前8任总督的住宅、办公室及大英帝国殖民地权利的象征。早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生活艰苦,社会动荡不安,总督府遗址对于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具有不平常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基础、排水系统和大量工艺品在内的建筑物的结构遗迹,认为“该遗址是一个作为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标志”。于是,一座现代博物馆和纪念性的市民空间在考古遗址和未开发区域上建成,考古遗址被保存在一个混凝土板下。遗址上的振动和荷载均有所限制,其中有两块场地在严格的环境控制下已向公众开放,在将要建造的研究场所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其考古文物及相关报告。依据澳大利亚《巴拉宪法》制定的实践方针和原则,第一步是对遗址的意义作全面评估,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及社会学等各方面意义的评估,同时还要对现存建筑做全面的检查。通过这些研究材料得出一个“文化价值报告”,并附以保护方针。在反映其独特文化价值的博物馆发展计划中,该报告和保护方针成为决定性因素^[10]。

青岛虽然仅有110余年建置历史,但是由于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昭显出不凡的文化容量与文化气度。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岛人认识到,新的文化项目不一定要进行新的建设,历史建筑旧址通过深入挖掘原有的文化内涵,在新时期同样可以有新的作为。与栈桥隔海相望,始建于1934年的兰山路1号礼堂,如今已经是享有盛誉的音乐厅;几街之隔,位于大学路7号的红十字会旧址成为书画爱好者经常聚首的美



图二 杭州胡庆余堂

人们的珍贵记忆，容纳进新的文化功能后，焕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舞台。青岛的一座座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是历史建筑保护性再利用的成功尝试和有益探索，特别是为20世纪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中，建筑旧址是人们参观的主体，这是任何新建的博物馆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新建的博物馆中，虽然也可以通过陈列展览的组合布置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但毕竟是人为营造。而历史建筑旧址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进行必要的总体环境设计，可以创造出真实可

信的历史环境。观众进入建筑旧址，感受历史氛围，这正是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的本质魅力所在。作为历史建筑旧址博物馆，应更加关注历史建筑本身与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的关联性，形成别具特色的专题博物馆。例如1989年建立的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位于西子湖畔，在有“江南药府”之称的百年老店胡庆余堂老字号建筑群的基础上创建。博物馆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分为陈列厅、作坊厅、养生保

木馆；正在筹建中的青岛建筑博物馆、小提琴博物馆等，选址意向也锁定在承载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建筑保护性再利用。“这些老建筑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生生不息的象征，也是一系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坐标，现代人也会以此作参照物，辨认日新月异的生存环境，青岛虽是座年轻城市，但丰富多彩的老建筑已成为构成青岛影像、传承城市文脉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11]。历史建筑旧址保持着优雅气质，延续着

健门诊部、营业厅和药膳厅等,使历史建筑与博物馆陈列展示融为一体。英格兰北部的湖区小镇凯西特,有一座独具特色的铅笔博物馆。馆舍利用生产车间收藏和展示世界各地的铅笔。除了铅笔实物,还展示有生产铅笔用的材料,例如颜料、木材等。通过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人们可以从中了解铅笔的历史、用途、制造工艺,还可以参观正在生产铅笔的加工企业^[12]。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8年启动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旨在通过与非营利机构的合作,争取实现公益事业和保护历史建筑双赢。2010年公布了第二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内容包括3大项目,预计修复费用总共约1.27亿港元,特区政府还将为负责计划的3家社会企业营运初期提供830万港元资助,依托各自的建筑特色和结构特点,将昔日的老建筑分别化身为环保训练营、服务大楼和主题餐厅等设施,不仅为历史建筑注入新的生命,而且丰富历史建筑的文化内涵,在改造性再利用中得到妥善保护。其中旧大埔警署将被“活化”为“绿学苑”,面向香港市民推广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提供教育课程和训练营,举办推广健康饮食的活动,设立文物展览馆等;位于港岛湾仔区的蓝屋建筑群将被“活化”为多元服务大楼,在继续为新老租户提供理想住所的同时,举办文化和教育课程及文物导赏团,运营两家食肆,并通过单位阁楼建筑展现早期香港的居住环境;位于九龙城的石屋将被“活化”为主题餐厅和旅游资讯中心,计划举办教育课程、导赏团等反映九龙城文物景点历史的活动。这些工程将于2013年下半年完成,项目实施部门有信心所有获选的计划都能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为社区带来良好效益^[13]。

二 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

名人故居是指某一历史人物出生、生活或从事活动,并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的场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名人故居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了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是城市记忆的守护者,是名人留下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应受到关注和保护。名人故居不仅凝练着历史名人的生命光彩,也映射着人文思想的博大光辉。同时,名

人故居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多重人文历史内涵。如果城市中每一位历史名人的行迹、思想与创作都能得到全面而精彩的展现,将使一座城市的精神魅力得以彰显,使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得以传承。文化记忆是无形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它的存在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来体现,即通过实物衬托出来。因为只有充分唤醒这些记忆,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人类文化整体的内涵与意义。山海之间,这些承载着文化灵魂的场所脉脉诉说着历史的记忆,也倾注着对未来的期待,也正是在历史与未来的复合视野中,人们看到了名人故居修复开放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 注重名人故居真实遗存

由于名人故居是历史上某一名人曾经定居、生活过的地方,因此,利用其旧址进行再现历史瞬间的复原陈列,通过对历史人物活动的展示,表现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的面貌,可以凸现出故居主人非凡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贡献,以及独有的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人们慕名而来,在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感、汲取历史的营养,从中获得生活的动力,有着普通博物馆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在欧洲城市中,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以不改变现有用途、实物保护与设立标志牌为主,以建设博物馆、纪念馆进行资料、图片陈列为辅。在一些名人一生中经历重要阶段的故居建筑物外墙上,镶嵌着醒目的标志牌,上面有被纪念者的头像和在此生活的时间。这些标志牌表达出人们对先人的缅怀。在英国,伦敦、利物浦、伯明翰、爱丁堡、曼彻斯特等大城市都设有名人“蓝牌”,共计900余块,其中70%设在伦敦的繁华地区。这些蓝牌由铁质搪瓷制成,上面有6行英文字。第一行字比较大,写着人名。下一行是他的职务、身份,再往下就是在何领域有何卓越贡献、生卒年月。最后一行是某年某月在此居住。英国实施“蓝牌”制的做法,不仅是为了让名人文化走进社会公众的生活,也是为了还原、放大、升华文化的价值和尊严。

在当今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如何保护好文化名人故居,如何使名人故居的保护性再利用融入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一直是文物界、文化界乃至

整个社会极为关注和倍感沉重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的文化名人故居的消失速度不断加快,拆除数量巨大,目前已被拆除的文化名人故居98处,占调查故居总数的31.81%。特别是在所谓“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大量文化名人故居被拆除,其中包括已列为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例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朱彝尊故居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林白水故居、尚小云故居、余叔岩故居等,均已荡然无存,有的名人故居则按照建设规划将被拆除。同时,由于保护、修缮和管理不力,大多数名人故居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采,这些名人故居主要集中在“大杂院”和一部分单位宿舍内,许多院落房屋年久失修,院内地面坑洼,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原有建筑格局遭到破坏,供电、用火带来的火灾隐患严重,名人故居内居民的居住条件亦亟需改善。目前,保护状况较好的文化名人故居只有74处,主要是一些单位办公用房和名人后代居住的独门住宅,其中辟为博物馆、纪念馆的只有8处,占总数的2.60%。除少数文化名人故居挂牌明示外,绝大多数淹没在建筑群之中,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名人故里之争硝烟不断,鏖战日趋白热化,众多省市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名人故里之争,历史上也曾有过。在古代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为提高本地文化地位,或出于编纂人的主观愿望,或出于当地官员的授意指点,在未进行考证的情况下,即将一些与本地有联系的名人的出生地、久居地写入当地地方志,结果就出现几处地方都是同一“名人故里”的矛盾。这些地方志不应作为依据加以采信。今天,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或者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一种文化焦虑,发现本地原有的文化根基不够扎实、文化色彩不够浓厚,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于是,当地与历史名人有关的一些内容,就会作为文化资源被“挖掘”出来。真正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合理整合文化资源,深化城市文化内涵,是必要的,但是,在当今研究评价历史名人时,经常出现无视前人的定评和民间的口碑,肆意颠覆历史名人形象的情况,这样将会伤害民众的感情,伤害民族的集体记忆,导致

社会价值观的失范和混乱。历史名人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体现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受到历代民众的尊重和保护。而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旗号,对历史名人“恶搞”、“戏说”、“抹黑”,那只能说是对历史的亵渎。

江阴市刘氏兄弟故居是我国文化名人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的故居,为一座200余平方米的清代民居。1990年,刘氏亲属将故居和一大批刘氏兄弟珍贵文物郑重捐献给国家,由当地政府修缮并筹备建立“刘氏兄弟纪念馆”。对此,当地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刘氏兄弟故居予以保护,并加以合理利用。但是,随着城市开发建设进程,刘氏兄弟故居却不断遭到厄运。2003年前后,当地政府执意要将刘氏兄弟故居“移建”。此计划遭到侯仁之教授、吴良镛教授等五位专家学者的反对,他们“紧急建议立即撤销拆建‘刘氏兄弟故居’的计划,保持历史文物原貌”,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组织专家现场勘察,使原定错误计划得以制止。但不久五位专家又第二次紧急呼吁,刘氏兄弟故居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以及道路建设,使故居处于被紧紧包围之中,待周边这些高楼大厦建成后,刘氏兄弟故居“则犹如一叶扁舟,飘摇在汪洋大海之中”,刘氏兄弟故居将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人文价值。遗憾的是,此次专家的建议并未得到重视,在短短一年中,刘氏兄弟故居南、北、东三面被新建的高楼大厦和城市道路紧紧包围。2004年8月,刘氏兄弟故居又被进行拆改,20多名工人边拆边垒,用红砖垒起了新墙^[14]。

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名人没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恐怕难以得到他国的尊重。其实“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争’一位史上著名的音乐大师,他曾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但是,各方争得却不是哪里是这位大师的‘故里’,而是在竞争,谁保存他的生活片段遗迹多、保存得好,因为谁这方面优胜,谁就能受到更多大众的青睐”^[15]。名人故居带来的首先应该是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其次才是各方面可能的利益。西班牙哲学家G.桑塔亚(G.Santayana)说过:“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今天社会应对历史名人多一份尊重,多一份责任。通过多种

手段和方式,将文化展示、思想教育、文化体验和旅游观光等相互结合,充分发挥名人故居的作用。例如上海市政府将一批作为办公用房的名人故居定期分阶段向公众开放,市民和外宾踊跃参观,既增强了人们对上海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认同,又起到了教育、宣传、展示的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城市形象。名人故居是天津 20 世纪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市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由文物、规划和旅游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有 26 处名人故居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在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了说明牌,目前已经成为天津文化旅游的热点地区。

(二) 展现名人故居文化价值

在欧洲,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对名人的呼唤,历史名人总和社区生活相随相伴。例如巴黎的名人故居资源非常丰富,不少世界顶级的思想家、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艺术家们的故居,都妥善保存在城市中。如今著名剧作家雨果的故居,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的故居,著名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的故居,著名雕塑家罗丹的雕塑工场,著名画家毕加索博物馆等均作为名人故居对社会开放。北京地区的名人故居资源同样非常丰富,是古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调查资料显示,在北京的历史城区内,有 308 处名人故居。从历史名人的类型看,可分为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经济、科技、医学和其他领域的名人,其中数量较多的是政治、文化和艺术类名人,这与北京的城市性质有关。从名人故居的历史产权看,有的是祖宅私产,有的是租赁房屋,有的是单位宿舍、公寓或会馆。这些名人故居大多是北京四合院传统民居中的精华,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物化载体,是无法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这些名人故居借助历史人物在全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故居所特有的文化氛围,能够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各地将陆续修复开放名人故居或建立名人纪念馆,作为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完善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举措。詹天佑纪念馆在宣传詹天佑精神和普及铁路知识方面卓有成效。为了全方位、多视角挖掘詹

天佑爱国创新的精神内涵,在陈列展览中增加了“做人·做官·做事”部分,突破工程技术领域,集中展示詹天佑的人格魅力,成为基本陈列的点睛之笔,不仅给观众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詹天佑,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而且促进了观众思想情感的升华。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事迹,是目前小学教材中的内容。詹天佑纪念馆的京张铁路“之”字线沙盘模型,以动态形式真实模拟火车双机牵引穿越八达岭的情形,形象直观,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而且可以亲自动手操作,大大增加了陈列展览的科普性、互动性和趣味性,可以有效辅助学校教学,充分发挥纪念馆在形象教学方面的优势,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同时,通过对普通观众不熟悉的一些文物展品,例如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期使用的水平仪、火车连接装置自动车钩的使用方法等,进行操作演示,简单易懂,激发了观众们的兴趣^[16]。

复原陈列是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通常采用的方法,即有根据地复原旧址内的陈设并展示给人们,展现出那一历史时代的气息,透露出更多的历史信息,更具有真实感,也更贴近参观者。通过复原陈列使观众了解曾经在旧址内活动的历史人物,发生在旧址内的历史事件,进而深入了解这段历史,获取有益的启迪。这种环境的真实性是其他博物馆所不具备的。但是,目前一些名人故居旧址复原陈列单调贫乏,展示内容单一,多以展示历史图片为主,而缺少实物资料,很难获得观众认可,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一些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中,常常看到的是破旧不堪的桌椅,空空荡荡的书柜,房间内零散地摆放着几件残破的日常用品,缺乏历史信息和生活场景,自然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陈列展览中的人物元素,是值得深入研究和表现的内容。实际上,场景中的细节是营造氛围的基本元素,只有深入挖掘细节,才能达到营造历史氛围的真正目的。只有展示的细节充实丰满,营造的环境才更具有真实感。但是,要复原一位场景中人物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就必须认真研究相关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志趣爱好,以及在旧址上发生的与该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并把研究成果制作成形象的展示,使观众通过这些特殊展

品，在真正的名人故居旧址上，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感受相关人物的魅力，获得更多的历史信息。

名人故居的文化价值主要是精神价值。一般来说，凡是重要的历史名人，都有大量以往专家学者对其生平事迹、学识修养、性情习惯和兴趣爱好的专项研究成果。通过细心研究史料，挖掘故居中看似平常的珍贵细节，才能再现出故居主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应该说名人故居的魅力与名人故居建筑的华丽与简陋没有直接关系，印象派大师梵高在巴黎郊区的故居，不但十分简陋，而且房间只有6平方米，但是一直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参观者在这样的故居建筑内，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画家的伟大情操。历史名人曾经居住过、工作过的地方，凡是能保护的应该尽量加以保护，其中一些具备条件的，建立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名人故居是社会文明的载体和象征。当人们走进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做出毕生贡献的名人故居时，心中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面对历史名人使用过的物品，历史名人居住过的房屋，仿佛历史忽然站立了起来，鲜活、生动、真实，看得见、摸得着。少数历史上知名的反面人物的故居，同样也对民众起着牢记历史的警示作用。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所蕴藏的独特内涵和肩负的社会使命，决定了它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特殊关注和期待。

当前，在名人故居的保护中，注重保护故居旧址本体却破坏了周边环境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对不合理利用故居的单位或住户进行搬迁安置，对故居建筑进行保护修缮，但是对名人故居旧址周边的环境却随意加以改造。一些地方为了突出名人故居旧址的地位，将历史名人原来的老邻居们拆迁搬离所居住的街巷或村庄，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花红柳绿的花园，修建纪念广场、移植高大树木、添加喷泉水面、配以灯光绿地，使名人故居旧址像纪念碑一样凸现出来。虽然环境“美化”了，但是历史名人成长的真实环境杳无踪影，名人故居旧址的原有记忆将被世代误读，破坏了历史名人生活和工作过的特定情节。现在不少地方喜欢在名人故居周边建设仿古建筑，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因为每一个经过历史磨砺的文化遗迹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是任何仿古建筑都无

法比拟的。名人故居旧址博物馆应重视总体环境的设计，不应随意改变周边环境，失去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要综合考虑故居内外环境，形成整体和谐的文化景观。如今大部分名人故居已经作为民居或单位用房被超负荷利用，对于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名人故居，各级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向居民详细介绍故居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使他们能够积极支持名人故居的保护。另外，还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调动名人后代、基金组织、保护协会等社会群体的力量，形成名人故居保护的合力。

（三）发挥名人故居教育功能

名人故居博物馆通过展现故居与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揭示其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对当今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名人故居博物馆展示内容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适合于知识获取和文化休闲。一般综合博物馆或专题博物馆，由于所展示的文物藏品脱离于它赖以产生的背景，孤立于它长期存在的环境，使普通参观者很难将文物藏品置于相应的时空场景中进行思考。而名人故居博物馆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个恰当的历史氛围，观众对故居建筑和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物资料，容易形成一个整体的、立体的、全面的认识。同时，名人故居博物馆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接收的意识，即由“参观博物馆”走向“阅读博物馆”。“阅读博物馆”是博物馆传播自身信息的新理念、新境界。名人故居博物馆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能使参观者了解每一件文物藏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了解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事件和人物，通过“阅读博物馆”，使观众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名人故居博物馆之中，并成为日常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名人故居博物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要，应作为评估博物馆文化传播效果的标准。伴随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名人故居博物馆的研究内容需要不断扩充，研究范围需要不断扩大。

青岛境内既有天下名山崂山，又有海产丰富的胶州湾，吸引了历代众多名人客寓或定居青岛。1930